

怪哉國家圖書獎

● 徐虹北

前兩天，看到電視新聞裏正在播放一條消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遇溺被人救起，而救他的人卻淹死了。這個孩子在鏡頭前說：「叔叔為了救我，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想起他一心為了他人、犧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和品質，心裏十分感動。」這孩子的話說得太對了，可就是沒有一點孩子氣。我納悶，他平時也這麼說話嗎？我想肯定不是這樣。但他畢竟受「教育」多年，知道面對攝像機應該怎麼說。這跟現在的孩子寫作文時必須說套話一樣，平時聊天進入一種語言系統：海闊天空，活潑有趣，語言生動形象；一旦寫作文、大會發言了，就都很自覺地納入了另一個語言系統：刻板機械，甚至面目可憎，語言社論化。這兩個系統的切換轉變，他們都能運用自如。孩子尚且如此，我們的老學者、老專家多是身經百戰的老運動員，就更知道在甚麼場合該怎樣說話，該說甚麼話。譬如，有資格充任國家圖書獎的評委們，心裏當然知道學術的標準是甚麼，但是三屆圖書獎發給了哪些書呢？我們首先來看國家圖書獎的獲獎標準是甚麼。

從1993年起，政府每兩年頒發一次國家圖書獎，意在表彰一批「質量優秀、貢獻突出」的圖書。甚麼才算是「貢獻突出」呢？細則劃分了五個等

級：首先是「對於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其次是「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及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有重要貢獻的」，再次是「對於國民經濟、國防建設有重要貢獻的」，第四是「對於出版事業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最後才是「有重要思想價值、科學價值、文化藝術價值或在思想界、學術界及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在思想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著作，並不是我們的國家圖書獎首先要扶持鼓勵的。譬如說，《顧準文集》。據說還有人質問這本書的出版者，為甚麼這本書會有這麼多的讀者，年輕人為甚麼都愛看這本書。這話問得蹊蹺，好書當然有讀者，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顧準文集》既有相當的學術含量，又有廣大的社會讀者，換句話說，就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很好。這樣的書與國家圖書獎無緣，恐怕大多數人都見怪不怪吧。

這樣的書不得獎，那麼甚麼樣的書得獎呢？科技類的專業書，我不懂。單就文史哲而言，我們如果把三屆國家圖書獎獲獎書目大致分一下類的話，似乎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時事需要的、有中國特色的應景書；一類是炒冷飯但規模宏大的全集大典；一類是從民族團結的需要出發的和親

書，這倒是頗有盛世修書的皇家氣派。獲獎書目中唯獨不大見具有學術原創性的著作。也就是說，獲獎圖書其實離我們日常的讀書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得獎書大約是為了擺在架上看的，而放在案頭讀的書又大抵是不適合得獎的。

那麼，國家圖書獎為甚麼喜歡把榮譽頒給一些人們不大讀的書呢？恐怕學術政治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譬如說，要講民族團結了，那麼甚麼樣的書該得獎，甚麼樣的書不該得獎，就有個政策問題了。即使當前沒有民族問題，也還要照顧到得獎的地區與民族，不能因為評獎而產生破壞民族團結的可能性，所以地域性的照顧也是必須考慮的。即使並不涉及民族這樣的大問題，評獎也有一個導向性的問題。你給他獎了，如果他有問題，就證明你也贊同他的立場。所以，我們評獎最好都給古文字，這樣最保險。否則，弄不好就有可能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曾經聽一位行政長官說：「現在有人藉口出全集，甚麼文章都往書裏印。這怎麼可以？全集中缺一兩篇文章有甚麼關係，不能因為一兩篇文章破壞我們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要是你再堅持全集要全的話，那你就是破壞改革了。」這讓我想起藉小說反黨的論調來，彷彿知識份子真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又未免太抬舉了讀書人。

不過，多數讀書人也很聽話，既然受了抬舉也就當真了，況且，聽話還是有好處的。於是，出版也有了度身定制，有人成了得獎專業戶。搞到後來，大家眼睛都盯着已經得獎的書目，玩起了類型化的把戲。甚麼類型的書容易得獎就出甚麼的書，沒有經濟效益也沒有關係，因為圖書有其作為精神產品的特殊性，也就是社會效益。談到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我就疑惑，一部好書，如果沒有相當的經

濟效益，也就是說沒有相當的讀者願意接受，又談何社會效益呢？得獎固然是社會效益的體現，但拿了獎就高束焉、皮藏焉，不說是孤芳自賞，那至少也是局部效益甚至是個人效益明顯大於社會效益。誰的個人效益？這就不需要我明說了吧。

前兩年出全集熱，而且容易得獎，於是就有人索性盯着名頭大的評委。有一次我在飯桌上聽到一家內地出版社的青年編輯吹噓自己的本領，他正在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的全集，老先生是國家圖書獎的評委。據那位青年編輯說，老先生發過話，說是只要出版社出得好，沒有錯別字，裝幀精緻，保證能得大獎。如果他說的是真的話，那這位老先生恐怕是有點糊塗了，他把國家圖書獎當作自家的水果糖，可以隨便抓一粒塞到愛鬧騰的孩子的嘴裏。

給評委出書固然是一條捷徑，如果評委的名頭不是大到可以隨意說大話，好像也不敢做得太過份。那麼，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人多勢眾，於是求大求全，名人掛帥，群策群力，多快好省，大幹快上，力爭上游。我查了一下三屆獲獎書目，一些多卷本叢書，規模最大的有100冊之眾，最多的責任編輯有108將。也許是受到了這樣的暗示或鼓勵，不少人匆忙組建編委會，最好是找評委的老師掛名主編。把這樣的書說成是學術垃圾或許是過份了，但也實在說不上有甚麼價值。因為它本來就是衝着大獎去的，往往是大而無當、華而不實，缺少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的學術積累與沉澱。有的作品大家明知不靈，還是一窩蜂地往上湧，而且搞到最後，限時限刻，要拿出來獻禮的。這究竟是學術研究呢？還是登台作秀呢？

也許我們頭腦裏盛世修書的觀念太重了，只是盛世修書與學術原創是

沒有多大關係的。四庫全書、傳世藏書，我不能說這些書出得沒意義，但至少可以說，這些書並沒有學術原創性，而且多少透露出一種好大喜功的心態。我不是說不要出這些書，但切不可鼓勵。要知道在中國這個習慣於一哄而上的國度，大家為了奔大獎、投巨資、拉關係、通路子，說到底，無非是希望從中拿到好處。因為獎就意味着位子、票子、車子、房子等。所以，評獎也就與學術無關了，而和升官、分錢是一回事。這是圖書界的悲哀，也是學術界的悲哀，更是讀書人的悲哀。

有人會說，你口口聲聲學術是個人的埋頭研究，可為甚麼還要在國家圖書獎這一類的官方榮譽裏面為獨立自由的學術著述佔一方地盤呢？難道優秀的學術著作只有得到官方的首肯才行嗎？不是說，民間的學術獎勵才是真正的學術空間嗎？這些話都不錯，就學術自身而言，它不應該顧及學術以外的諸多非學術因素，但是難道政府不應該支持在思想學術界廣有影響的作品嗎？我想，誰也不會說不應該。畢竟，學術的意義在於提供一個民族自身思考的深度與高度。遠的不說，二十世紀40年代，自由知識份子以其超凡的「崗位定力」堅守自己的學術陣地，湧現出一批有真才實學的大學者與著作，像錢穆的《國史大綱》、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呂思勉的《中國通史》、錢端升的《中國政制史》、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迄今為止，這些在抗日炮火中誕生的學術經典還未曾被逾越。我後來看到湯一介的〈湯用彤先生〉一文，才知道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也得過獎。那是1942年，當時教育部授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以最高學術獎。湯用彤得到消息後還很不高興，對同事說：「多少年

來都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的書要誰來評獎！」由此可見湯用彤確為「一純儒之典型」（錢穆語）。當年和他一起得獎的還有馮友蘭的《新理學》和金岳霖的《論道》，可以說都是當時教育部認定的一流學術著作。我並不是說這些書一定要得甚麼大獎才有價值，它們即使不得獎，也照樣會站在後來者的書架上。湯用彤拒絕獎勵，這是「毋戚戚於功名，毋孜孜於逸樂」的湯先生對自己學問的自信。教育部頒獎則體現當時行政機構對學術發展的關注與重視，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這件事給我兩個啟發。一是，學術不依傍政治，特立獨行，才是真正的學術。這樣的作品固然應該得獎，就是不得獎，也都是響噹噹、留得下來的傳世之作。所以，大家不必忙着去搶大獎，得不到獎倒在其次，關鍵是出一些真正留得下來的好書，譬如北京三聯書店的「讀書文叢」、「文化生活譯叢」及近兩年的「哈佛—燕京叢書」中就有不少好書。當然，我也並不是要大家拒絕任何來自官方的榮譽，但至少不要把眼睛總盯着得大獎，這樣才可以保持一個知識份子的純正立場，保持自己公正的批評。此外，政府倒應該扶持學術，像當時的評獎也確實為後人留下了過硬的著作。所以，希望我們現在是評獎，而不僅僅是做好平衡工作。難道我們現在的評委不如當年的教育部官僚？顯然不是，而是我們的評委的腦子裏雙重意識太分明了，就像那個被人救上岸的孩子，很容易把學術標準給忘卻了。也正是為了這忘卻的紀念，我冒昧寫下這些文字，希望中國的學術繁榮能得到出版界切實的鼓勵與支持。

徐虹北 上海青年評論家